



解除封闭后的第一餐堂食，献给了我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们。他们一共有五位，其中一位同学在德国交换延期毕业，其余四位都顺利拿到了学位证，也找到了工作，十分不易，我很为他们开心。学生们也很有意思，说要送我一个“小礼物”，他们曾经担任过我《西游记》导读课的助教，所以想给我一棵西游元素的盆栽，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奇怪的植物。不过和学生交流，始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可以知道很多新鲜事，都是手机大数据刷不到的趣闻。

我念书的时候，习俗里会称这样一餐饭为“散伙饭”。我硕士毕业时，也吃过这样一餐。记得那天非常随意，中文系研究生人数不少，因为专业方向不一样，很多同学我念完三年书都不太认识。“散伙饭”那天，坐在我身边的同学很紧张地问我，“这里是中文系的桌子吗？”但创意写作专业有些不同，因为学生人数多，共同体的意识就会强一些，不会发生到了毕业，同班同学第一次说话的事情。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毕业聚餐，老师们都会来聊天（主要是请客）。

博士毕业时，我答辩完在台湾吃一餐“谢师宴”，风俗和上海不太相同。台湾同胞很重视“谢师宴”，男生都要穿衬衫西装，女生都会穿比较正式的裙子，门口还要



寻常周末，寻常午后，我在露台上洗棋子，把藏的污纳的垢，彻彻底底地涤荡一回。不一会儿，旁边手机的微信聊天群里堆满了“未读”。

上周我被拉进一个围棋群，成员都是些见诸报端的围棋名人，连全国专业围棋杂志做过三张彩页报道的职业七段方捷也在里面。新人进了群，专修闭口禅，不说话，不打字，最多抢了红包后发个表情。通过一周的观察，我发现这个活跃的围棋群主要职能是下联棋，通俗地说就是二打二。群主沈兴，曾经代表新民晚报勇夺全国晚报杯团体冠军，负责群内匹配结对，相当于头上插一朵花的媒婆。

群里大多是中年人，年轻时或有过鹏程万里，戴过各种光环，现如今找个简简单单的工作，娶个普普通通的老婆，生个可爱爱的孩子，度过平平淡淡的一生。彼此之间更多的是用棋盘和棋子交流一下人生经验，胜负看得淡淡的，像天边的云。只



签到。放眼望去，穿T恤短裤就来的，基本都是大陆学生，好在老师对我们都比较宽容。因为合照不好看，台湾同学还会借给我们西装外套，自己穿衬衫一起合照。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到了毕业季节，天气极其炎热，穿得很正式出门会有负担。不过，我记得白先勇老师上《红楼梦》课时，也是每次都穿正装。想起来这些小事，是因为这次聚餐他们跟我说，

到花花世界去

张怡微

在创意写作读书第一年，彼此都有很强的服饰焦虑，后来自己也去买了很多衣服。而我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些。我猜想，这些年这些细微的风俗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他们也穿得很漂亮来和我吃“散伙饭”，拍照的时候又很严肃，鬼脸都没有一个。

坊间称经历疫情的学生为“疫三届”，我和学生大都在网上交流。但他们自己有群组，和我又有群组，真正的交流，其实我也看不到。在我看来，他们个个都很辛苦，作息很辛苦，对未来也很焦虑。但他们不太跟我说细节。我问他们好不好，有吃的吗？写作有困难吗？他们都没说没问题。一直到现在，都要毕业了，在饭桌上他们突然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是怎么打

算？”“你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每天待在家里，写作材料都是哪里来的？”“现在你有工作了，出书还是为了钱吗？”“为什么要买房子呢？”大有一种，斗胆问一问，问完就跑的架势，很好玩。

这是一个很“真心话”的时刻，好像我不说些什么真心话，就会辜负他们的期望。于是我也掏心掏肺说，“我特别害怕你们四个人，有三个找到了工作，一个没找到，这样吃饭的气氛就会很怪，还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最后大家在一片“苟富贵勿相忘”的祝福声中，结束了“散伙饭”（他们又去别的地方继续聚会啦！）

有时学生会把我随口说的话，记得很清楚，当成压力，搞得我很自责。我可能（其实记不清楚）建议过一个学生去考托福，结果他很认真问我，“你是不是还是希望我去考托福”。但我也只能，硬拗回来，“多学点技能也挺好，至少不要犯法。”最后变成了我的毕业祝福，“不要犯法”。

他们也写小卡片给我祝福，祝福我保护颈椎和关节，祝福文学继续陪伴我、抚慰我的灵魂、甚至幽默地疯狂地祝福我成为“一代宗师”，我看得笑中带泪，又很喜欢。其实我没教他们什么，但我们能有这场相遇，是我很珍惜的缘分。

我也会永远记得这场离别。记得我有四个很喜欢的学生，在2022年，各自去往他们自己的花花世界。

能翻译俄文，又同时能翻译英文文学作品的翻译家十分罕见，荣如德却是其中的一个。他翻译的俄语小说《叶儿绍夫兄弟》《痼病房》《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以及英文文学作品《奥克利弗·退斯特》《道连·格雷的画像》《花花世界》在翻译界声名卓著。多年来，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他的译文也得到出版社编辑的一致认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的副总编辑孙绳武老先生在给荣如德的信中说：“《卡氏兄弟》这部冗长繁琐、杂乱的书在你的笔下，竟能于短短数月间奇迹般地

完成译事，我觉得这是热情执着和高度熟练的结晶。无论目前有几位另外的译者在译，我相信这个译本是会站得住的。”这是对荣如德译作非常高的评价。

我和荣如德相识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是一条弄堂里斜对门的邻居。他侄儿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正因此，我经常到去他家。他大我十四岁，可谓是忘年交了，我

随他侄子叫他“小阿叔”。我有时会和他谈及翻译工作，他会自然地流露出对几位恩师的感恩之情。

荣如德出生在一个平

翻译家荣如德的几位恩师

潘玉鹏

民家庭，儿时读书断断续续。抗战结束，他才得以考入私立光华大学附中读初中。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教英语的徐燕谋和教国文的徐承烈兄弟俩，从此在这两位恩师的引导下奠定了日后做翻译工作的基础。

徐氏昆仲当时乃是光华大学一代名师、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高足，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同门弟子。徐燕谋上课时喜欢在学生座位过道中穿行，侃侃而谈，生动活泼，尤其在讲解英语的介词时会使用各种比喻深入浅出地让学生受用一生。荣如德听课时被徐老先生的风采和学问所深深吸引，引发

了他对外语的浓厚兴趣，也深受徐燕谋的青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徐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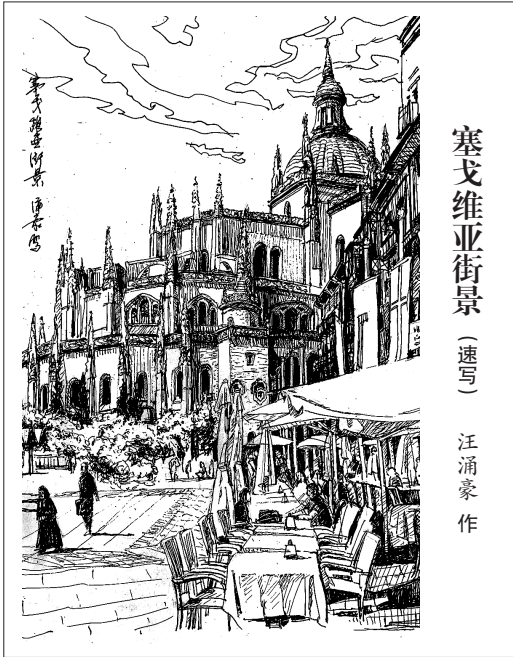
影响了巨大的。”一是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二是拥有了深厚的中文功底。他可以背诵出许多名篇，我一直记得诵读袁枚《祭妹文》中“朔风野大，阿兄归矣”时，他潸然泪下的场景，足见他读书时全身心的投入，中学几年他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他常提及的还有一位恩师李莎，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的夫人。她是俄罗斯人，俄语教育家，曾获普希金奖和普京的多次嘉奖。她随丈夫来到中国后，一直在培养我国的俄语人才呕心沥血。1950年，荣如德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录取，开始学俄文，因为中学英语基础不错，学习俄语就显出了优势。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编入翻译教研组，教俄译汉，后又教汉译俄。1956年，被派往北京参加全国俄语统编教材的编撰工作。在那里，他面对面接触到李莎。李莎当时是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顾问，有很



高的文学素养，每周有几天来上班。于是，荣如德抓住了这一良机，得以当面请教，经常带着问题前去和她交流，在这段时期，荣如德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尤其在耳提面命中，在日常的点拨中感受到许多俄语的真谛。他学的不再是汉式俄语，使其无论在口语或是书面语，俄语水平都突飞猛进。除了学习语言外，李莎还更多地和他谈论19世纪俄国文豪和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等于给他上了一门俄罗斯近现代文学课。这对他后来从事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眼下，在荣如德“米寿”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文集。译文集由15卷墨绿色精装本组成，收入了荣如德翻译生涯中出版的大部分译作。这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翻译家，虽然从不喜欢显山露水，但他却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寒戈维亚街景（速写）

汪涌豪作

赛，你可以选择抱大腿啊。

我抱住了全场最粗的一条大腿，没错，就是方捷老师。但我还是很慌，每次落子，都好像摸电门一样。耳边总能幻听到围观群众的窃窃私语：恨铁不成钢，烂泥扶不上墙。中盘，对方发起了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每次在我觉得抵挡不住的时候，身边的方捷老师虎躯一震，再震……方捷老师掌控能力太强，后半盘完全接管了棋局，直到对手认输。

我长长久久吁了一口气，准备接受队友的批判再教育。兴许是和我不大熟吧，方捷老师展现了他高情商的一面：说这盘棋宝宝老师下得很好，只有一个地方有疑问。我感觉到自己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了。

驱车开过智慧桥，来到一个创意园，今天有家棋馆开业，请来了十几位职业棋手捧场。照例职业棋手走个过场，棋馆老板就把他们领进饭店了。可

是这一天，饭店圆桌上总觉得少了一个人，原来方捷老师还在棋馆里。老板匆匆赶回，远远看到方捷老师正在给爱好者摆棋，摆棋的手很有艺术感，手

掌有一点薄，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干净整洁。一谈到棋，他的眼角斜斜飞起，眉梢布满笑意，整个人像路边一株向阳而生的悬铃木，散发着勃勃生气。

刚过去的一周又搬家了，这是来洛杉矶的两年中第三次挪窝了。朋友住的一栋公寓楼里正好空出一间，为占这枚空巢，不仅请室友和同来自韩国的房东打人情牌，还立即签约下定，结果本来租住的房间尚未找到新家，落得夏天要付两边租金的窘境。

但所有怨气等到了新家一扫而空。这是我来到三十多岁头一回独自坐拥整个公寓，尽管曾经的室友个个友善谦让，但因共用厨房和浴室，无形中总有根弦绷着，不是担心自己烧菜起油烟，就是怕自己插的鲜花会招惹蚊蝇，最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炒菜改煮面，鲜花换干花。

新家让我自在，不仅因为整只螺蛳壳全由我做

滚，只是觉得有节奏的震颤随着木质房梁传到我的房顶和四壁，咚咚咚咚，永不休止。

逢邻居生日，音响一定升级加仑。刚过去的四月，有个周末晚上我忽然感到家门口在

宁静致远

钱佳楠

开演唱会，有专业DJ在介绍他准备播放的曲目，且似乎一呼百应。等我开门探身张望，才明白是半街远的黄房子在搞“名副其实”的派对（加州人把“名副其实”叫legitimate，本义是合乎法律，我感到颇为讽刺）。屋前的草坪被电影片场的大灯照亮，DJ在门廊上对着麦克风大吼，旁边是大型音箱，四围站着着装风凉的年轻男女，俨然把此当成海滩。

派对到午夜还没消停的迹象，室友和我都好静，无奈中决定报警。结果一查，有关噪声的报警不能拨打紧急热线，须拨一个专门的座机号码，我们打了两次，两次都是遥遥无期的等待，害我们觉得此号恐怕是糊弄人的。最后只得往耳朵里堵上两块海绵耳塞，一头钻进被子（洛杉矶已迫使我习惯每晚塞耳塞睡觉）。

人是矛盾又贪婪的个体，既贪恋都市的烟火气，又嫌弃随之而来的喧嚣和嘈杂。在上海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那些闹中取静的地方，如绍兴路、永嘉路，方才还是车水马龙的大道，往这些小巷一钻，世界一下子静了下来，连法国梧桐都青绿了不少。

诸葛亮《诫子书》有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古之人诚不我欺也。一旦周遭静谧无声，不仅时间放缓了脚步，人的感官似乎也放大了多倍，这或许

是“专注”的由来吧？搬进新公寓的一周，我还忙着清扫整理，但丝毫不妨碍我啃完了五本大书，很久都没有如此酣畅淋漓地读书了。以前看杨绛回忆录，说钱锺书整日徘徊在“饱蠹楼”，把深奥的哲学、美学等大部著作，“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而今的我只是好奇，那“饱蠹楼”是如何完美隔音的？

乔迁后的第一个周末，原室友发来简讯，“又是周六晚上了，你那儿怎么样？”啊，已经周六了，我竟然不知不觉，惹起室友一肚子的羡慕。

七夕会